

资本逻辑与分工的“联袂”：内卷式竞争透视*

丁正¹ 冉津宇²

(1.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715;

2.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25)

[摘要]当前,内卷式竞争已经突破原有领域边界,呈现出泛化倾向。作为资本逻辑与旧式分工结合下的历史性产物,其并非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生产方式层面深层矛盾的具体外化。资本逻辑下劳动力的商品化催生了劳动者间的强制竞争,分工则实现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二者的耦合不仅划定了人的“可能性发展空间”,更通过技能固化、劳动时间隐性剥削、自我剥削意识内化等隐蔽机制,使劳动者被迫陷入过度竞争之中,加剧了人的发展片面化问题,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低效配置与浪费。然而,内卷式竞争亦展现出其“非终极性”。作为生产力与分工体系结构性冲突的外化形式,它既是旧式分工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亦是其自我否定的“破坏性力量”,客观上为分工形态的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积蓄条件。因此,立足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纾解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在于深入把握其背后的生产方式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核心路径,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与分工体系、破除旧式分工的结构性壁垒,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合理引导和对内卷式竞争的扬弃,最终推动分工形态的历史性超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资本逻辑 分工 内卷式竞争 全面深化改革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3-0061-10

在《等待戈多》中,贝克特通过描绘“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戈多’”,制造了一个“不可能到来的到来”,象征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盲目追逐“进步”却陷入空转的境地,这种“空转”与内卷式竞争不谋而合。针对“内卷”问题,国外学界多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使用“内卷化”概念描述一种文化模式的发展达到

极限从而不断精细化的现象:“渐进的复杂性即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单调下的鉴赏性。这就是内卷化。”^{[1](P99)}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分析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时,使用“农业内卷化”描绘了一个“在资本、土地等资源有限,增长的劳动力持续进入农业生产导致不断精细化、复杂化的过程。”^{[2](P80)}国内学界关于“内卷”问题的解读始于20世纪黄宗智

收稿日期:2025-09-07;修回日期:2025-1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23YJC7200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社会科学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数字劳动批判研究”(SWU22095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成长专项项目“马克思有关历史规律必然性的阐释方法研究”(MKS2023046)

作者简介:丁正,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与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研究;冉津宇,博士、讲师,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Philip C.C.Huang)《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书中针对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做了脚注,并分析了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和内卷化现象之间的关系。^{[3](P6)}之后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黄宗智进一步分析了农业内卷化与现代化的关系。^{[4](P131)}目前,国内学界对内卷式竞争的研究主要呈现为经济社会、基层治理、制度变革、子女教育和社会交往等五个方向。^[5]有学者从法学角度分析了内卷式竞争的内在机制和治理方案。^[6]有学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基层治理中的“内卷化现象”。^[7]有学者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了“内卷”与教育政绩主义。^[8]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内检索,有学者从马克思“关于工人之间竞争的原理”进行分析^[9],有学者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进行解读^[10]。总的来说,当前学界关于内卷式竞争的解读大多停留在具体现象层面,主要对内卷式竞争这一“过度竞争现象”进行“点对点”的剖析和批判,没有深入探究内卷式竞争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经济根源,因此必须回归到现实历史的基础即社会生产方式中进行深入挖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11](P23)}立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正常的合理竞争可以激发社会生产的活力,但内卷式竞争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徒耗。因为内卷式竞争作为资本逻辑下分工的必然产物,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而只有“生产主要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即以盈利为导向而不再以需要为导向运作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12](P16)},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卷式竞争根源于“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资本主义的生产盈利和资本增殖导向赋予了“劳动过度化”和“竞争过度化”的历史必然性,而分工的异化则进一步规定了人的可能性发展空间,人只能在特定的领域内,受资本逻辑的驱动不断进行这种“过度竞争”。因此内卷式竞争实际就是“资本逻辑

与分工相结合所引起的劳动过度化倾向,这种倾向映射在生产关系领域就表现为一种过度竞争现象”。目前,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力发展还不够“充分”,旧式分工仍然在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即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卷式竞争是“发展阶段性矛盾”。因此必须重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内卷式竞争现象,必须“处理好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明确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既要发挥“资本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又要避免资本无序扩张以及由此产生的危害。

一、内卷式竞争因何必然:资本逻辑与分工的结合是其“质料因”

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不是简单站在以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肩膀上,作出不同的结论,因为以往“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13](P98)}马克思关注的,是以往被认为不必解释的“前理解”问题、是看似“自然”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有必要阐明内卷式竞争的生发根源,即这一现象为何出现,又为何会采取这一形式?在资本逻辑下,劳动力商品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强制竞争制造了“工人的分裂”。分工则使“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使劳动者成为这个生产体系的“执行者和照看者”,在历史性地“强制”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使劳动者个人被异化为“片面发展的人”,只能从事这种“局部操作”,只能同与其共同从事这种“局部操作”的劳动者相竞争,劳动者出于生存的需要只能被迫“内卷”。

(一)劳动力商品化与强制竞争催生“工人间的相互敌视”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前提。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被迫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以换取生活资料。这一生产方

式的确立强制性地将劳动者纳入市场交换关系,使其与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形成一种“看似自由实则强有力”的双重依附关系。劳动者难以实现“阶层跃迁”,只能同与其有着相同境遇的个人竞争。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13](P412)}。即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生成了一种看似“天然的”强制竞争关系。但是,这种强制竞争关系并不能等同于“工人之间的相互敌视”,而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即“工人之间的竞争仅仅是各资本竞争的另一种形式”^{[14](P42)}。因此,在资本逻辑下,劳动者被“物化”为商品,被迫“还原”为“原子式的个人”。这种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和倾向,使劳动者不仅降低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还通过这种看似“天然的”强制竞争机制使个体之间本来的、潜在的协作关系转化为异化的、对抗性的矛盾关系,并且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关系会随着分工的细化而日益加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15](P44)},最终衍生出内卷式竞争这一结构性的社会病态现象。

(二) 分工是实现“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核心工具

通过分解原有劳动过程,分工将劳动者彻底纳入资本逻辑的控制下:“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16](P297)}劳动过程的碎片化使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变成了不断简单、重复的操作,摧毁了劳动者的自主创造性,使其沦为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的“活劳动效率零件”。同时,资本逻辑下的分工重构了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13](P381)}。这种分工协作使资本

家扮演了“指挥者”的角色,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程度。即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并非出于其自主意志,而是服从于资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资本增殖”的需要,劳动者个人则被“人为地”划定了一个“活动空间”,其“主体性因素成为生产的障碍”^[17],因此他们只能是“这个体系的照看者和指令的完成者”^[17],资本通过分工,使劳动者彻底成为其“附属品”。此外,分工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则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物化控制”:劳动者被纳入机器体系的运转逻辑,劳动被异化为“机械重复的生理动作”,劳动者的主体性被彻底消解,成为资本增殖链条中的可替换要素,只能被迫接受资本设定的竞争规则,进行无意义的“内卷”,劳动者也就无法突破现行生产体系的束缚,实现健康的竞争和有效的发展。

(三) 资本逻辑下分工具具有“强制性进步”作用

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既是资本的“自然天性”,即“资本在价值增值方面不存在内在的限度”^{[12](P103)}。同时也是一种“强制”,即“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13](P312)}。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逻辑下分工和自然科学不断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使资本生产力得以迅速提高,进而引发整个行业在生产领域内的效仿学习,“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18](P96)}。但是相对的,这一行业的整体利润率会因此降低,因为这一行业内部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减少。就市场流通的具体过程而言,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会推动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当个别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获得超额利润时,会吸引资本流入该行业,扩大供给并压低价格,最终降低这一行业的整体利润率。此时分工在资本“逐利天性”下发挥的“强制性进步作用”,一方面提高了行

业整体的生产效率,但是也进一步压缩了劳动者的生存空间:整体利润率的降低使资本作出将商品的价值压到最低限度的决定,“正是资本才实现这种决定,……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18](P102)}。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不断降低,为了满足其生存需要只能迫使自己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在生产过程中则表现为“内卷”这种个体强制性外部竞争形式,而这种过度竞争只是变相地减少了资本家对可变资本的投入^{[18](P96)},本质上仍然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

二、内卷式竞争何以可能:资本逻辑下的分工问题是其“形式因”

在资本逻辑下,分工通过专业化要求使劳动者形成对资本家和生产资料的双重生存依附,导致劳动者技能单一化和劳动过程的碎片化;通过对劳动时间的隐性控制强化,劳动者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可支配自由时间被强制剥夺;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劳动者只能不断强化内卷,其自我意识逐渐被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吞噬,从而陷入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自我剥削”陷阱,无法生成对其自身生命意义的主导能力。内卷式竞争既是资本逻辑下分工问题的具体体现,同时又加剧了这种异化。

(一) 资本逻辑下分工制造劳动者的“技能固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工通过推动“劳动过程专业化”以提高生产效率,实质上是将劳动过程强制碎片化,目的是攫取高额的剩余价值。这种专业化分工作为异化劳动的强化形式,使“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13](P392)}。商品生产的整个劳动过程被分解为孤立、重复的片段,劳动者被禁锢在某一高度限定的生产程序中,导致劳动者技能单一化,

仅能掌握局部技能,形成“单一技能依赖”。此外,分工专业化过程还表现为技术性垄断压迫过程。资本家通过对精神生产成果如技术专利、职业技能壁垒等的垄断和技能封闭,使劳动者沦为“局部工人”,无法突破现行资本逻辑下分工体系的结构限制。在这种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劳动者单一且高效地从事某一生产工作的效率得以提高,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一切都以牺牲劳动者的活动空间为代价,即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被“天然地”划定了一个可能性空间,只能在这个“凝固的空间范围内”活动,只能同其他劳动者相竞争。这种竞争在一定历史阶段被激化后以内卷式竞争的形式表征出来,劳动者只能获得片面的发展,这种片面发展使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被资本物化为工具理性的附庸,而非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

(二) 资本逻辑下分工强化“劳动时间的隐性控制与延长机制”

在资本逻辑下,劳动者本应占有的“生命时间”变成了可计算性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劳动者必须将生产效率最大化,降低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率,以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13](P268)}时间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家通过“柔性剥削”将劳动时间由工作日的“直接延长”转向“隐性延长”。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不仅要从事正常生产工作,还要做好面向消费者的服务工作即“自愿性无偿劳动”,才能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劳动者也就必须被迫“主动”延长劳动时间,从而受到“自我与资本的双重剥削”。而且,资本通过专业化分工与标准化管理将劳动者强制纳入竞争体系中:劳动者只能将时间与精力集中于单一技能,获取其他知识、技能或从事创造性活动的空间被压缩;标准化管理则通过一些具体的奖惩措施迫使其在生产过程中和生产过程之外展开双重竞争,这种过度竞争没有创造更多价值,只是为资本创造了更多剩余价值,强化了劳动

力市场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减少了劳动者的“可能性发展空间”。因此，在整个资本逻辑下，专业化分工使劳动者的“生命时间”被碎片化，这种资本对“自我发展的时间剥夺”使其无法自主占有时间发展自身。因为“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在偷窃了资本家”^{[13](P270)}，也就无法突破现行分工体系的生存逻辑，打破内卷式竞争的局限，实现其自由全面发展。

（三）资本逻辑下分工导致劳动者“自我剥削”的意识生发

在市场竞争中，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可以说是资本之间竞争的另一种形式。资本为了维持其竞争优势，只能加大对技术和人力的资金投入，整个行业平均利润的减少又会导致边际效益递减，只能通过压缩劳动力成本，减少可变资本的投入，转嫁压力给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在极易发生的“价格战”面前，劳动者只能通过提高自身的劳动强度、不断进行“自我剥削”以提高其竞争力，这样个体的竞争只局限于部分存量资源的争夺，也就会陷入“产能扩大—产能过剩—更低报酬”的“内卷陷阱”中。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更多的劳动者被“代替”，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自动化、智能化技术与专业化分工的结合为资本保持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劳动力过剩现象则迫使劳动者转向其他生产部门，呈现出市场无法调节的劳动力供需失衡问题，“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13](P630)}。劳动者为维持生存只能“默认”接受这种“低工资—长劳动时间”的变化，这种变化则意味着“不稳定状态”的常态化，而“不稳定状态的蔓延催生了更多的内卷和焦虑”^[19]，最终陷入“必须内卷才能生存”的心理陷阱。同时，资本通过将分工与具体制度的结合，为劳动者设置了一个“断裂”的生产空间，一方面劳动者被资本划分为不同的身份群体，在分工异化与劳动区隔的过程中，通过实行薪

资差异、权益优待和设置招聘壁垒，迫使劳动者之间展开不自觉的、非生产性质的内卷；另一方面劳动者身处这个“断裂”的生产空间内，也会出现意识“凝固”和自我价值怀疑，即个人不仅丧失对劳动过程的整体认知，还会将内卷合理化为个体责任、内化为自身道德价值尺度，掉入“内卷即努力”的“自我剥削意识陷阱”中，这是一种全新的“精神暴力”，它“将导致精神上的梗阻，是一种内在的恐怖”^{[20](P12)}。“自我剥削意识”的产生，本质上是资本为维持竞争优势、延缓其内在矛盾爆发的产物，而非个体选择的结果。

三、内卷式竞争缘何暂时：资本逻辑与分工的内在矛盾是其“动力因”

内卷式竞争作为一种历史性现象，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内卷会刺激工人提高对劳动的投入，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产品的产量、扩大经济规模。”^[9]其证明了“劳动的分工对个人的简单性、整全性、以及伟大性是如此不利——对人类物质的发展来说是需要的”^{[21](P38)}。另一方面，内卷式竞争作为一种过度竞争现象，在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体现出资本逻辑下旧式分工的不可持续性和自我否定性。因此，作为资本逻辑下分工问题的历史性体现，内卷式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绝非“永恒困境”。

（一）暂时性之源：生产力与分工体系的结构性冲突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14](P412)}这一矛盾运动过程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催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进而要求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与专业化，但是既有的社会分工体系建立在旧有的生产力基础之上，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无法容纳新生产力所带来的劳

动形式变革。在这种矛盾下,生产力与分工体系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导致资源在无效的过度竞争中被徒耗,而分工体系是生产关系形成的物质基础,生产关系则是分工体系的制度性表现,因此这种竞争本质上是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外化,内卷式竞争正是旧的生产关系即将被打破的前兆,这一现象既是旧制度的“慢性衰亡”过程,也是新制度的“渐进萌芽”,而旧的分工体系也会在生产力发生质变后被新的分工体系所取代。在“变革”的过程中,内卷式竞争作为矛盾展开的“阶段性顶点”而非“终点”,可以将其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特殊性”动力,也即内卷式竞争本身蕴含着纾解这一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内卷式竞争的暂时性并非对现实问题的回避和否认,而是强调这一现象本身内在的“阶段性”和“非终极性”。

(二)暂时性之由:社会裂隙的扩大与分工的自我否定

“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14](P42)}作为劳动者的个人只有“被迫竞争的自由”,因而也就只有“被迫内卷的自由”。生产力与分工体系(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冲突以内卷式竞争作为矛盾激化的“显性表现”,这种过度竞争既反映出劳动者与“不劳而获者”的对立,又加剧了这种对立,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内卷式竞争导致资源进一步向优势群体集中,相对弱勢的劳动者则陷入低工资陷阱,当这种结构性矛盾被具体化为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异问题”时,以代际矛盾、地域冲突和性别对立等为标志的观念冲突就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劳动者之间的内卷会造成劳动者群体内部的分裂,强化“紧张的”社会关系,扩大社会的“裂隙”,不利于人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内卷式竞争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徒耗,最终会导致双重矛盾的集中爆发:在经济层面上,内卷式竞争造成行业利润率降低,生产与消费市场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在竞争内耗中消逝”而不断萎缩,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导致

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最终瓦解资本积累的基础;在社会层面上,内卷式竞争会引发劳动者群体甚至全体社会成员的“群体性焦虑”,社会信任瓦解,整个社会被进一步“撕裂”……通过这种极端化竞争,内卷使旧式分工的内在矛盾达到社会可见的临界点,迫使社会承认旧分工体系的历史局限性,因而成为旧式分工自我否定的“破坏性力量”。

(三)暂时性之向:旧式分工的消亡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内卷式竞争作为资本逻辑下分工问题的当代体现,内在蕴含着否定旧式分工的力量。通过科学技术的更新迭代,旧式分工已然面临一场“去劳动化”危机:资本在内卷式竞争中不断流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领域以降低成本,却也破坏了旧式分工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迫使资本重新调整分工结构,一方面加剧了劳动者的失业危机,另一方面也逐渐消解了旧式分工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二元对立,为未来转向“智力协作型”分工创造条件。同时在内卷式竞争中,分工已出现一种“开放化”和“水平化”的趋向:资本之间的过度竞争打破了旧式分工中的信息垄断,更加开放的知识与技能学习方式削弱了专业壁垒,使劳动者能够身兼多重技能,更容易进行跨领域合作,这种“技术水平化”为“层级化”的旧式分工转向“网络化”的新式分工提供了现实基础,也是未来社会实现“自由联合的个人”和“协作分工”的可能性所在,也即内卷式竞争事实上已经成为旧式分工自我解体的催化剂。在资本逻辑与分工相结合的“强制竞争”过程中,劳动者为了增强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一方面不断增加自己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则通过不断学习各项技能以迎合市场需要,客观上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质言之,内卷式竞争实际上是旧式分工消亡的“历史性过渡环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性前夜”。未来社会的发展,正是通过吸收内卷式竞争所揭示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将分工从异化工具转化为人自由

发展的载体，最终实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P53)}。

四、内卷式竞争何以扬弃：全面深化改革与分工的历史性超越

内卷式竞争作为资本逻辑下分工问题的当代体现，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匹配和生产力与分工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与当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分工体系，妥善处理同资本的关系。同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逐渐消除旧式分工中不利于人的发展的因素，最终实现分工形态的历史性超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内卷式竞争扬弃的必然要求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P412)}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发展是决定人类社会历史走向的“归根结底”的力量。因此，破解内卷式竞争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动生产力革命，突破旧分工的技术局限。当下，因地制宜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应对国际竞争与技术变革的关键，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是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路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指出：“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3]。加快构建以创新为导向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以人为本的分工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引导“存量竞争”转向“增量创造”，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挖掘新消费领域、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方式拓展发展空间，才能以“做大做强蛋糕”的方式消解滋生内卷式竞争的土壤。

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否则“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4](P412)}。要想纾解“内卷”现象，就必须变革在发展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分工体系。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当下，中国部分行业存在产能相对过剩、低效重复建设和过度无效竞争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立健全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4]。这一要求正是通过变革相应的生产关系，引导资源流入创新和质量导向的相关领域，以“优化整合资源配置”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纾解内卷式竞争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性负面影响。

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需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竞争作为一种“纯粹自然”的社会现象本身并无特殊含义，只是无意义的过度竞争——这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经过人们头脑意识的加工被赋予了“内卷”的特定语义，因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P412)}。“内卷”这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正是现实问题在人们观念中的“映射”，因此必须转向关照现实问题。内卷式竞争的“强制性”“破坏性”和“隐蔽性”特征反映出当下市场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等上层建筑存在不足，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领域需重点强化制度建设，完善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制度，在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通过制度改革助力企业打破同质化竞争壁垒，以“更加合理完善的制度”消除内卷式竞争的在场条件。

（二）破除旧式分工是内卷式竞争扬弃的必由之路

在马克思看来，旧式分工限制了人的发展，使人的劳动单一化，出现“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

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导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形成“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13](P407)}这种旧式分工与资本逻辑的结合，使大量社会资源流入某一特定领域，不仅在微观上为劳动者个人的发展划定了一个“可能性范围空间”，也在宏观上形成了一个低质量、同质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为内卷式竞争的出现提供了结构性土壤，而劳动力与资本的结构失衡——“劳动者”同“不劳而获者”的对立，其所引发的供求矛盾则加剧了内卷式竞争的根源——即私有制条件下发展不充分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也不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必须着眼于破除旧式分工。

破除旧式分工需要进一步变革生产方式，在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变革时，由政府提出一系列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措施，这同消灭旧式分工、实现更合理的分工在目标和道路上完全一致。旧式分工所引发的内卷式竞争，这一社会结构性负面现象也会随着其内在矛盾的激化而解决，即“异化与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路径”。具体来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整治一些领域的‘内卷式’竞争。”^[25]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流通、流入高质高效领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产业链分工，推动建立更公平、更多元、更合理的分工体系，以减少内卷式竞争的诱因，其本质是要消除旧式分工的地区与行业壁垒。

旧式分工的破除将使社会分工从强制性、片面性分工转向自由协作式分工，避免因旧式分工下职业固化导致的低效重复性竞争。需要生产关系变革、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三位一体式”协同，平衡效率与公平问题，推动社会从低效竞争转向高质量发展。此外，还需将着眼点置于“现实的人”身上，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为某一领域内的劳动过剩化以及由此展现

出的竞争激烈化，因此需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于人本身，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使其能够自由选择发展行业，降低因选择困境或资源垄断而引发的过度竞争，“打破区隔人、压抑人的旧式分工，避免机械式、碎片化的分工结构对人的全面性和创造性的消解”^[26]。通过破除旧式分工的结构性矛盾消解内卷式竞争风险，推动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内卷式竞争扬弃的必然趋势

在资本逻辑与分工的结合下，个人发展具有强制性、片面性特征。内卷式竞争作为资本逻辑下分工问题的当代体现，激化了这种分工模式的内在矛盾，呈现出自我否定的趋势。重复低效的过度竞争一方面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在强制劳动者进行竞争的同时，也使其为迎合市场需要、满足自身生存需求而被迫进行跨专业、跨领域的学习。这种“资本剥削与自我剥削的双重剥削”客观上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3](P561)}，由此奠定了基础，即异化的过程中内在蕴含着扬弃异化的因素。

因此，在旧式分工的内在矛盾通过内卷式竞争显露、激化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超越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破除资本逻辑下分工对劳动者个人发展的限制。在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凸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将改革与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相结合并具象化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之中。始终坚定将“现实的人”本身作为改革的价值指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制度性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真正成为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

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7](P652)}，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旧式分工已经消亡，劳动本身不再由私有制和分工强制规定，劳动者能够根据其个人兴趣、能力及社会需求自由选择。成员摆脱异化劳动束缚，劳动成为自我实现的手段而非谋生手段。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机制已经建立，劳动组织形式由全体成员共同规划，避免旧分工导致的片面发展，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互相分工协作”代替了旧式分工下的“对抗性关系”，内卷式竞争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将真正到来。

五、结语

马克思认为，“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商品生产普遍化了，它又使社会的分工不断增进”。^{[28](P42-43)}内卷式竞争既是分工问题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又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其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工体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的历史性展开。作为一种历史性现象，内卷式竞争有其出现的必然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要求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丰富，内卷式竞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展现出其“不合理性”。因此需要我们重新检视劳动的意义和目的，以马克思分工理论分析内卷式竞争出现的必然性与暂时性，厘清资本逻辑下分工的历史性作用和内卷式竞争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性批判，纾解其产生的社会结构性负面影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正着力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推动分工从“内卷式”向“创新型”“协作式”转变。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 [1] GOLDENWEISER A. Loose ends of a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6.
- [2] GEERTZ C.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3]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4]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5] 卢晓雯. 多维视角下的内卷化: 研究现状及概念梳理[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130-136.
- [6] 孙晋. “内卷式”竞争的内在机理和法治方案[J]. 现代法学, 2025(4): 53-65.
- [7] 刘燕舞. 内卷化: 一个基层治理研究概念的知识社会学再考察[J]. 求索, 2024(6): 72-82.
- [8] 王正平. 教育优绩主义的伦理审视[J]. 伦理学研究, 2025(4): 53-61.
- [9] 刘明明. “内卷式”竞争祛魅: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之间竞争的原理分析[J]. 思想战线, 2025(2): 1-8.
- [10] 戴亮.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内卷化”现象探略[J]. 长白学刊, 2022(2): 64-72.
-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五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 [12] [德]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资本论》导论[M]. 张义修, 房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15] 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17] 陈飞. 劳动对资本的两种从属及其权力向度[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9): 35-44.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19] 蓝江. 功绩社会下的倦怠: 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J]. 理论月刊, 2022(7): 5-11.
- [20] [德]韩炳哲. 倦怠社会[M]. 王一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 [21][美]麦卡锡.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M]. 郝亿春, 邓先珍, 文贵全, 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杜飞进. 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法[N]. 人民日报, 2024-06-25(9).
- [24]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N]. 人民日报, 2025-03-13(1).
- [25]罗文.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N]. 人民日报, 2025-05-16(10).
- [26]孙璇.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批判及启示[J]. 哲学研究, 2025(1): 56-67.
-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苏聪文】

The “Alliance”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 Perspective on Involuntary Competition

DING Zheng & RAN Jinyu

Abstract: At present, involuntary competition has already transcended sectoral boundaries and shows a generalized tendency. As a historical product produced by the coupling of capitalist logic and the old division of labor, it is not an accidental social phenomenon but a concrete externalization of deep contradictions at the level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Under capitalist logic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r gives rise to coercive competition among workers, while the division of labor effects the de facto subordination of labor to capital. The coupling of these two forces not only delimits people’s “possible space for development,” but also drives workers into excessive competition through concealed mechanisms such as skill ossification, implicit exploitation of labor time, an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elf-exploiting dispositions. This, in turn, aggravates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 and produces wasteful, ineffective consump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However, involuntary competition also exhibits a non-final character. As the externalized form of a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division-of-labor system, it is both a concentrated outbreak of the old division of labor’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a destructive force that negates that order; objectively, it accumulates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vision-of-labor forms and for more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Therefo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rx’s theory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key to relieving involuntary competition lies in thoroughly grasping the underlying contradictions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must be the core pathway: by developing qualitatively new productive forces, constructing appropriately adapted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ystems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dismantling the structural barriers of the old division of labor, we can rationally steer capitalist logic and overcome (sublate) involuntary competition—ultimately promoting a historic transcendence of division-of-labor forms and realizing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Keywords: logic of capital; division of labor; involuntary competiti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